

从新剑桥增长模型到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当代转向

刘文超 路 剑

内容提要: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初创期和90年代的成熟期之后,如今它已基本取代了新剑桥增长模型成为当代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主体。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产生与发展是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转向,这种转向是深刻的:就模型研究的主题来说,从揭示增长对分配的影响转变到揭示分配对增长的影响;就模型关注的重心来看,从利润实现机制研究转变到投资决策机制研究;就模型提供的政策含义而言,从收入再分配问题转变到经济增长体制问题。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是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的升级版,相比自己的前辈它更具理论穿透力,更具政策导向性。通过对其进行适当的引申和扩展,它可以为分析我国当前工资水平上升的增长效应提供理论依据,为我国实现利润导向向工资导向的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指导,因此我国学者对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展开追踪研究势在必行。

关键词:后凯恩斯主义 增长理论 新剑桥增长模型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理论界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非主流学派,它以增长理论而著称,而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以专注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而备受关注。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一直是经济增长模型家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相应地被区分为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前者归因于罗宾逊和卡尔多的贡献,被称作新剑桥增长模型;后者继承了卡莱斯基的传统,被称作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初创期和90年代的成熟期之后,如今它已基本取代了新剑桥增长模型成为当代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主体。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被认为是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的“升级版”(Stockhammer, 1999),相比自己的前辈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它已成为与主流新古典增长模型分庭抗礼的主力军,为不满主流增长理论的学者提供了备选方案(拉沃,

2009)。

与新剑桥增长模型相比,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现实增长问题的分析更具理论穿透力和政策导向性,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滞胀、发展中国家自由化改革的失败、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等问题上提供了深刻的分析视角,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为主体的后凯恩斯主义新增长理论对于破解我国当前遇到的企业工资成本压力加大、产能过剩严重、经济增速放缓增长等困境问题同样能够提供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然而,我国理论界对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这一当代转向与发展关注不够。

本文旨在对后凯恩斯主义新、旧增长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并对新增长模型的发展做出梳理;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发展进程中发生的当代转向的内涵,对这种转向的积极意义与

^{*} 刘文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邮政编码:071000,电子邮箱:jmliuwenchao@126.com;路剑,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电子邮箱:ndlujian@sohu.com。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Q151108)、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ZD201516)、河北省农业农村经济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不足进行评析并对其前途做出展望。本文希望能够引起我国学界对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发生的当代转向,即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新剑桥增长模型的取代及其现实意义的关注。

一、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①

(一) 增长率、利润率的决定与节约悖论

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是由新剑桥经济学家罗宾逊(Robinson, 1956, 1962)和卡尔多(Kaldor, 1957)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创立的。作为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由短期分析扩展到长期动态分析的理论成果,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建立在众所周知的凯恩斯主义宏观静态均衡条件——储蓄投资相等($S=I$)的基础之上。通过 $S=I$ 等式两边同除以资本存量,旧增长模型把静态均衡条件动态化为 $\frac{S}{K}=\frac{I}{K}$,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动态均衡条件为:社会整体的净储蓄(相对于资本存量)必须等于意愿的净积累率。这个动态均衡条件涉及储蓄方程 g^s (即 $\frac{S}{K}$),和投资方程 g^i (即 $\frac{I}{K}$)的具体形式。

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中的储蓄方程来自卡尔多(Kaldor, 1956),更早可追溯到卡莱斯基(Kalecki, 1942)。他们假设,社会由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构成,他们的收入分别来自工资和利润,工人基于工资的储蓄倾向 s_w 为零,资本家基于利润的储蓄倾向 s_c 为正。于是储蓄方程可表示成:

$$g^s = \frac{s_c P}{K} = s_c r \quad (1)$$

其中, P 是利润收入, $r = \frac{P}{K}$ 表示利润率。对于投资方程,早期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利润为投资活动提供了激励,所以,企业家根据预期利润率做出投资决策,为了分析方便,可由当前利润率代替预期利润率;同时,企业家资本积累的热情和冲动(被称作“动物精神”)对投资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投资方程可表示为:

$$g^i = a + br \quad (2)$$

其中, $a(a>0)$ 代表企业家的动物精神, $b(b>0)$ 代表投资对利率的反应系数。

综上所述,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可表示成如下代数形式:

$$\text{投资方程: } g^i = a + br$$

$$\text{储蓄方程: } g^s = s_c r$$

$$\text{均衡条件: } g^i = g^s$$

首先,可得均衡解:

$$r^* = \frac{a}{s_c - b}; g^* = a + \frac{ab}{s_c - b}$$

如图1中第I象限所示,储蓄曲线和投资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增长率和均衡利润率。

其次,均衡值对 s_c 分别求导数,可得:

$$\frac{\partial(r^*)}{\partial s_c} = \frac{-a}{(s_c - b)^2} < 0; \frac{\partial(g^*)}{\partial s_c} = \frac{-ab}{(s_c - b)^2} < 0$$

可见,利润率、经济增长率均与储蓄率存在反方向变动关系,这就是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所揭示的著名的“节约悖论”:资本家整体的节俭,即高的储蓄倾向,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和利润率;资本家储蓄率的降低、消费支出的增加,会带来经济的高增长和利润率的提高。图1的第I象限通过储蓄曲线的变动展示了“节约悖论”。当资本家的储蓄率由 s_{c1} 下降为 s_{c2} 时,储蓄曲线向右旋转,此时的均衡增长率 g_2 和均衡利润率 r_2 均高于初始值 g_1 和 r_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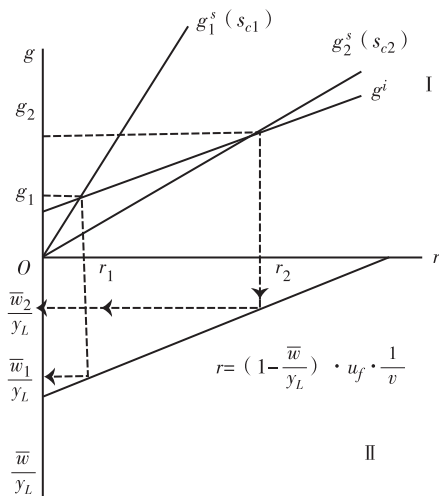


图1 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均衡图

(二)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的重要特征在于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认为,收入分配由经济增长速度内生决定。早期后凯恩斯主义者的收入分配机制借助了灵活价格机制:投资的变动引起社会总需求的变动,从而引起相对于货币工资的物价水平的变动,导致工资实际购买力的变化,最终导致不变总收入中工资、利润份额的变化。这种收入分配机制不仅需要灵活价格假定,而且还需要产能充分利用的假设,也就是说经济处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只有在产能充分利用条件下,投资需求的变动才会充分反映在物价的变化上,

同时,利润与工资也才处于此消彼长的完全对立状态。否则,在闲置产能状态下,投资增加时,物价可能不变,而工资和利润也完全可以以不变比例共同增加。对此,可以通过对利润率的分解来进行说明:

$$r = \frac{P}{K} = \frac{P}{Y} \frac{Y}{Y_f} \frac{Y_f}{K} = \pi \cdot u \cdot \frac{1}{v} \quad (3)$$

其中, $r = \frac{P}{K}$ 代表实际利润率, $\pi = \frac{P}{Y}$ 为收入中的利润份额, Y 是实际产出或国民收入, Y_f 为产能充分利用时的产出或国民收入, $u = \frac{Y}{Y_f}$ 为实际产能利用率, $\frac{1}{v} = \frac{Y_f}{K}$ 为产能充分利用时的资本—产出比的倒数,它由技术条件决定,可假定为常数。根据利润份额与工资份额之间的关系,方程(3)又可写成:

$$r = \left(1 - \frac{\bar{w}}{y_L}\right) \cdot u \cdot \frac{1}{v} \quad (4)$$

其中, $\bar{w} = \frac{w}{p}$ 为实际工资率, $y_L = \frac{Y}{L}$ 代表人均产出或劳动生产力,它由技术条件决定,可设为常量,于是 $\frac{\bar{w}}{y_L}$ 代表产出中的工资份额,它与实际工资率变动一致。

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的拥护者把实际产能利用率视作全产能利用率(u_f),它是外生给定的,即 $u \equiv u_f \equiv 1$ 。他们认为,长期而言,保留过剩产能对企业是不利的。因此在旧增长模型中有:

$$r = \pi \cdot u_f \cdot \frac{1}{v} \quad (5)$$

或

$$r = \left(1 - \frac{\bar{w}}{y_L}\right) \cdot u_f \cdot \frac{1}{v} \quad (6)$$

因此,利润率 r 与利润份额 π 或工资份额 $\frac{\bar{w}}{y_L}$ 之间只存在唯一的函数关系。只有利润份额的上升才能提高利润率,而这需要通过价格机制压低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的办法来实现。所以在灵活价格和充分产能利用的假设前提下,利润率与实际工资率或工资份额存在反方向变动关系。

在图1的第II象限中,在给定常量 u_f 情况下,有唯一的一条曲线来描述工资率 \bar{w} 与利润率 r 之间的关系。在第I象限画出了储蓄曲线 g^s 和投资曲线 g^i ,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增长率和利润率。在确定了均衡利润率之后,再借助第二象限的利润率—工资率关系曲线,得出实际工资率的值。所以,在旧增长模型中,工资率和工资份额是模型内

生决定的,是增长率和利润率决定过程的派生结果。

当资本家的储蓄率由 s_{c1} 下降为 s_{c2} 时,随着增长率和利润率分别由 g_1 和 r_1 上升为 g_2 和 r_2 。实际工资率也由 \bar{w}_1 下降为 \bar{w}_2 。因此,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在发现了节约悖论的同时,还得出实际工资率与增长率、利润率存在反向关系的结论。

(三)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的发展

经过罗宾逊、卡尔多的努力,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创立起来了。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相关问题的研究大量出现,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时的研究关注、继承和发展的不是增长模型而是分配模型。换句话说,研究者专注于利润实现机制(储蓄函数)的研究,而忽略了投资决策行为(投资函数)的研究。在这期间,卡尔多的分配理论得到了扩展,其结论更具一般性。

卡尔多的分配模型假设工人没有储蓄,社会储蓄完全来自资本家的利润,帕西内蒂(Pasinetti, 1962)考虑到工人阶级有储蓄、从而利润也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更为一般的情况。他建立的模型得出与卡尔多完全相同的结论:工人储蓄不影响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收入分配,也不影响利润率,收入分配和利润率只取决于资本积累率(经济增长率)。蒋中一(Chiang, 1973)提出一个三储蓄倾向的分配模型,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的分配模型作为两个特例来处理,使得剑桥分配理论更为一般化了。

萨缪尔森和莫迪利亚尼(Samuelson & Modigliani, 1966)用新古典方法证明了帕西内蒂只揭示了经济均衡增长的一种可能性。他们认为,当工人和资本家的储蓄系数在一定范围之内时,帕西内蒂定理有效,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纯粹”资本家消失,一切资本都归工人所有,均衡增长过程中的一切相关变量由工人储蓄倾向决定,这种相反的情况,被他们称之为“反帕西内蒂定理”。如何回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反帕西内蒂定理,是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的一个兴奋点,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回应进一步推进了帕西内蒂定理的扩展。这些扩展包括:卡尔多(Kaldor, 1966)提出“新帕西内蒂定理”;巴兰兹尼(Baranzini, 1975)在论文《帕西内蒂定理和反帕西内蒂定理:一个调和》中指出反帕西内蒂定理在理论上存在,但不具有现实意义,而帕西内蒂定理更具一般性,具有普遍意义;艾哈迈德(Ahmad, 1986)论证道,反帕西内蒂定理是帕西内蒂定理的一个特例。

(四)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的特征概述

基于前面的介绍,对于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的特征可概述如下:(1)暗含着产能充分利用的假设。该模型假设产能无论何时都得到了充分利用,没有过剩产能,也就是说经济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时也就是利润—工资边界。由于资源已得到了充分利用,任何产出的扩大都要求资源从消费品生产转向资本品生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价格调整就是完成资源配置的机制:价格上升导致实际工资被削减,利润增加,进而使得储蓄适应投资。(2)实际工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利润率反向变动。该模型从产能充分利用假设出发,借助其灵活价格调节机制,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实际工资与经济增长、利润率之间负相关关系的结论。(3)收入分配由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内生决定。在该模型中,由工资率和利润率所确定的收入分配是由储蓄率和动物精神等确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内生决定的,收入分配状况完全从属于经济增长的过程,收入分配本身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自主因素,相反,它取决于增长速度的因变量。(4)揭示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和提出收入再分配政策主张。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揭示出增长速度上升会导致“强制储蓄”的现象,从而发生有利于资本家不利于工人的收入分配的必然性,它指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两极分化的趋势,因此政府有义务进行干预调节收入分配,早期后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策略。(5)偏废投资决策机制研究的畸形化发展。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的发展表现为分配理论取代增长理论、片面沉溺于利润实现机制的模型化推导而抛弃投资决策机制研究的畸形化特征,这窒息了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活力(刘文超,2015)。

二、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

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存在两个严重缺陷:首先,从理论上说,它和凯恩斯的短期理论相违背,因为在凯恩斯短期分析中,收入调节使经济趋向均衡,而在后凯恩斯旧增长模型中,经济趋向均衡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数量的变化,而是借助价格机制,进而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实现储蓄投资相等;其次,从实践上说,旧增长模型关于工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利润率反向变动的结论与事实不符。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内部出现了对旧增长模型的反思和批判,并尝试开发与现实经济实践以及凯恩斯思想更为一致的增

长模型,这些模型更多地继承了卡莱斯基的经济分析传统,因此,这些模型被称作“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Rowthorn, 1981; Dutt, 1984, 1990; Amadeo, 1986; Blecker, 1989; Taylor, 1991; Lavoie, 1992, 1995)。以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为基础扩展开来的大量关于增长的理论研究使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特征

新增长模型之所以被称作卡莱斯基主义的,归因于它们包含有卡莱斯基对增长分析的如下要点(Lavoie, 1995):(1)存在过剩产能,产能利用率是灵活的、内生决定的;(2)资本家根据产能利用率做出投资决策,也即加速数原理对资本积累发挥关键作用;(3)边际成本恒定不变直至最大产能;(4)价格是成本加成类型,由直接成本加成形成的价格受广泛因素影响,这些影响因素的总体被冠以“垄断程度”。这些方面都能体现出后凯恩斯主义新、旧增长模型之间的差异。但二者最根本的区别我们可以归结为一个假设和一个结论上的分歧。就假设而言,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假设的是一个完全竞争世界,进而产能处于充分利用状态,而新增长模型假设的是一个寡头垄断世界,因此经济长期运行在过剩产能状态;就结论而言,旧增长模型最重要结论是,实际工资率(或工资份额)与利润率、积累率之间长期中呈反向关系,提高积累率从而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以牺牲工资率为代价,而新增长理论的关键结论则是,实际工资率和利润率、积累率之间通常有一个正向关系,不同阶级之间可以实现共赢。

新增长模型的倡导者认为,由于采取均衡方法取消了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用收入分配揭示储蓄投资均等化的做法,导致旧增长模型关于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不切实际的结论,只要回到凯恩斯的传统,长期分析中承认产能利用率的灵活性,用收入变化来解释储蓄投资的相等,增长与分配之间关系的不切实际的结论将不复存在。当然,长期中坚持灵活产能利用率假设正是卡莱斯基分析的特点。新增长模型的倡导者从恢复灵活产能利用率假设入手,改造旧增长模型。阿马德奥(Amadeo, 1986, p. 148)说:“我将发展一个模型,其中有效需求对产能利用在长期中有一个影响。……我们应准备研究产能利用率是一个内生变量的可能性,即使在长期。”

(二)理解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中的“产能利用率”概念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灵活

产能利用率”这个根本特征,我们首先需弄清楚它们运用和理解的三个概念:全产能利用率 u_f 、正常产能利用率 u_n 和实际产能利用率 u 。“全产能利用率”就是指企业设备得到充分利用,达到最高产出,没有闲置的机器可供使用;“正常产能利用率”是企业预期在长期中会平均实现的利用率,它“本质上,根植在经济代理人的心中”(Committeri, 1986, p. 180);“实际产能利用率”指,长期平均而言,由实际有效需求决定的实际发生的产能利用程度。

卡莱斯基主义者认为,相对于正常和实际产能利用水平,企业的产能规模总是过大,存在过剩产能是一种常态。企业有动力维持一个过剩产能,这是基于三个原因(Ciccone, 1986):(1)经济波动。由于经济处于波动中,有效需求水平也是波动的,企业总是把产能确定在预期需求达到峰值的水平,因为企业不愿在需求上升时,失去市场份额。(2)不确定性。企业家能意识到经济环境永远是不确定的,经济现实总是有可能超出预期,所以未来的需求峰值有可能比当下预期的峰值更高。一旦需求超出预期,如果设置的产能规模大于预测的需求峰值,是有利可图的。(3)固定资本经济上的不可分性。如果更大产能的设备使更经济的生产方法得以采用,即使产能规模超出了预期的产出水平,也是合算的。企业过剩、闲置产能存在的假设是灵活可变产能利用假设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过剩产能就没有产能利用变化的空间。

“灵活产能利用率”或“内生的产能利用率”这种语境中所讲到的“利用率”指的是“实际产能利用率”,也就是说,新卡莱斯基主义者认为,实际产能利用率是可变、具有弹性的,是由一些模型所考虑的因素内生决定的。实际产能利用率的可变性是相对于“正常产能利用率”而言的。由于不确定性,由实际需求所决定的实际产能利用率与预期的正常产能利用率是系统性不一致的,总会发生偏离,即使从长期来看也是如此。

齐克恩(Ciccone, 1986)批评罗宾逊等人的长期均衡稳态分析——把长期理解成预期的持续实现。他认为这是对长期进行没必要的特殊限定。齐克恩认为长期位置就是引力中心,但不必和实际情况重合,长期位置和不稳态增长状况完全兼容;这种对“长期”的理解为预期的落空留有余地,正是这种落空可能性引发了实际和正常利用率的不一致。科密特里(Committeri, 1986)对此表示赞同,他说:“这个正常位置的概念是完全与有效需求原则兼容的,因

为它没有把积累分析限定在这种虚构的稳态之上”(p. 180)。

(三)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三个关键方程^②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由三个关键方程构成,我们依次对它们进行介绍。

1. 新卡莱斯基利润方程。卡莱斯基主义者反对把产能利用率假设为外生给定的,他们从灵活、可变产能利用率入手构建模型,所以他们的利润方程采取了方程(3)和(4)的形式,即, $r = \pi \cdot u \cdot \frac{1}{v}$ 和 $r = (1 - \frac{\bar{w}}{y_L}) \cdot u \cdot \frac{1}{v}$ 。方程(3)和(4)就是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第一个关键方程——新卡莱斯基利润方程的两种表达方式。利润方程采取(3)和(4)的形式还是(5)和(6)的形式,是后凯恩斯主义新、旧增长模型之间的根本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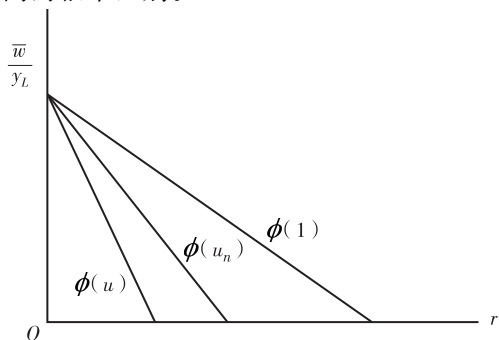


图2 受产能利用率约束的工资份额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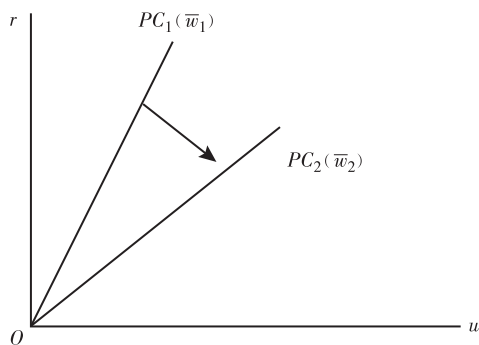


图3 利润曲线以及实际工资率变化的影响

把方程(4)看作利润率与工资份额之间的函数,则这个函数关系与实际产能利用率 u 相关。在图2中,我们画出了由方程(4)产生的一簇曲线,每条曲线和一个特定的 u 值相对应。在每一特定利用率水平下,工资实际水平 \bar{w} 或工资份额 $\frac{\bar{w}}{y_L}$ 与利润率 r 具有反向关系,但当利用率 u 可变时,同一工资水平或份额也会对应不同的利润率水平,同时不同工资水平

或份额对应同一利润率水平。况且如果工资水平直接影响产能利用 u , 则工资与利润率的关系就需更具体地讨论了。这是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关注的。

如果把方程(4)看作是利润率 r 与产能 u 之间的函数, 则这种函数关系与实际工资水平 \bar{w} 相关。对于任意给定的实际工资率, 由方程(4)产生的曲线被称作利润曲线, 可参见图3。在图中, 当实际工资率为 \bar{w}_1 时, 利润曲线为 PC_1 , 当工资水平上升时, 参考方程(4)可知, 利润曲线以原点为轴向右下方旋转。当工资从 \bar{w}_1 上升到 \bar{w}_2 , 利润曲线从 PC_1 旋转到 PC_2 。

2. 新卡莱斯基储蓄方程。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中的传统储蓄方程(1)分别与新卡莱斯基利润方程(3)和(4)相结合, 则产生了新卡莱斯基储蓄方程:

$$g^s = s_c \cdot \pi \cdot u \cdot \frac{1}{v} \quad (7)$$

和

$$g^s = s_c \cdot \left(1 - \frac{\bar{w}}{y_L}\right) \cdot u \cdot \frac{1}{v} \quad (8)$$

储蓄增长率 g^s 与实际产能利用率 u 具有线性关系, 这种线性关系与储蓄率 s_c 和实际工资率 \bar{w} 相关。储蓄增长率 g^s 与实际产能利用率 u 之间的线性关系可以用储蓄曲线来表示。在图4中, 储蓄曲线 g_1^s 描述的是在某一特定的储蓄率水平下, 实际工资率为 \bar{w}_1 时, 储蓄增长率 g^s 与产能利用率 u 的对应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实际工资率提高到 \bar{w}_2 (即 $\bar{w}_2 > \bar{w}_1$) 时, 根据方程(8)可知, 储蓄曲线向右下方旋转, 如图旋转到 g_2^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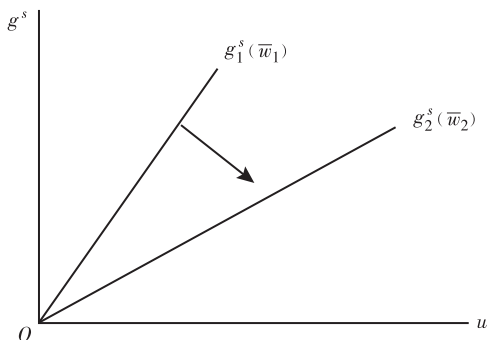


图4 储蓄曲线及实际工资率变动的影响

3. 新卡莱斯基投资方程。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中投资方程的一个简单版本是把投资需求仅看作是产能利用率的函数, 具体写成如下形式^③:

$$g^i = \alpha + \beta(u - u_n) \quad (\alpha, \beta > 0) \quad (9)$$

此投资函数的第一项 α , 可以被看作是预期的

销售增长率。当企业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和正常利用率一致时, 即 $u = u_n$ 时, 企业希望资本存量增长率或资本积累率与预期销售增长率保持一致, 即 $g^i = \alpha$ 。新卡莱斯基主义者也把 α 视作代表动物精神的参数。第二项 $\beta(u - u_n)$ 表示的是企业总是希望产能利用回到正常利用率水平的愿望。如前所述, 正常利用率 u_n 是企业意愿的产能利用水平, 是企业家综合考虑不确定性等因素, 预留出适当的过剩产能的一种理想状态。当实际利用率高于正常利用率时, 即 $u > u_n$, 企业发现没有充足的闲置产能, 于是企业就会提高资本积累率, 以致超过预期的销售增长率, 即 $g^i > \alpha$ 。反之, 当实际产能利用率低于正常值, 即 $u < u_n$ 时, 企业发现出现了过大的过剩产能, 它就会降低资本积累率, 使得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低于预期的销售增长率, 即 $g^i < \alpha$ 。系数 β 测量投资或资本积累面对产能利用率变化时的调整速度。

储蓄方程(8)与投资方程(9)联立方程组, 确定唯一的产能利用率和经济增长率。用图形表示, 就是由储蓄曲线与投资曲线之间的交点确定增长率和产能利用率。直观上可以看出, 只有储蓄曲线斜率大于投资曲线斜率时, 均衡才是稳态的。即经济过程稳定的条件:

$$\beta < s_c \cdot \pi \cdot \frac{1}{v} \quad (10)$$

它的含义指投资对产能利用率变化的敏感性小于储蓄的敏感性时, 经济才会收敛向均衡点。条件(10)是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预设前提。

(四) 均衡分析: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中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把前面分别论述的工资—利润关系曲线、利润曲线、储蓄曲线、投资曲线描述到一个四象限坐标系中, 会清晰地表示出实际工资率、增长率、产能利用率、利润率之间的关系。见图5, 第四象限的纵轴代表工资份额, 起始点是由“垄断程度”决定的工资份额 $\frac{\bar{w}}{y_L}$, 实际工资水平为 \bar{w}_1 , 二者对该模型来说是外生变量。在特定的 \bar{w}_1 水平下, 确定了一条储蓄曲线 $g^s(\bar{w}_1)$, 见第II象限。在第II象限储蓄曲线与投资曲线相交, 交点确定了均衡增长率 g_1 和均衡产能利用率 u_1 。 u_1 在I、II象限的纵轴标出。第I象限给出了利润曲线 $PC(\bar{w}_1)$, 利润曲线的位置由外生给定的工资水平 \bar{w}_1 确定, 它表示给定工资水平 \bar{w}_1 下, 产能利用率和利润率的一一对应关系。由储蓄、投资曲线决定的均衡产能利用率为 u_1 , 通过

利润曲线 $PC(\omega_1)$ 决定了利润率水平为 r_1 , r_1 在第 I、IV 象限的横轴标出。现在回到第 IV 象限, 在第 IV 象限画出了产能利用线 $u=u_1$, 它表示产能利用率为 u_1 时工资份额与利润率的对应关系, 点 $(\frac{\bar{\omega}_1}{y_L}, r_1)$ 落到了产能利用线 $u=u_1$ 上, 参见方程 (8)。由整个分析可以看出, 实际工资率 (或工资份额) 决定了产能利用率, 进而通过产能利用率又决定了利润率。

(五) 比较静态分析: 成本悖论

在图 5 中, 假定经济整体的垄断程度下降, 实际工资率 (和工资份额) 上升, 从 $\bar{\omega}_1$ (和 $\frac{\bar{\omega}_1}{y_L}$) 上升到 $\bar{\omega}_2$ (和 $\frac{\bar{\omega}_2}{y_L}$), 与之相适应, 储蓄曲线从 g_1^s 向右上方旋转到 g_2^s , 利润曲线从 PC_1 向左上方旋转到 PC_2 。新的

储蓄曲线 g_2^s 与不变的投资曲线 g^i 相交, 交点决定了新的均衡增长率 g_2 和产能利用率 u_2 , 这两个值都大于初始值。更高的产能利用率 u_2 借助新的利润曲线 PC_2 , 决定了新的利润率水平为 r_2 , r_2 也大于初始值 r_1 。在第 IV 象限可以看到, 新的、更高水平的实际工资率和利润率组合是与更高的产能利用率 u_2 结合到一起的。

新增长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揭示了成本悖论: 虽然对个别企业而言, 工资成本上升会带来减少利润率、积累率、产能利用率的不利影响, 但社会整体的工资成本上升会带来正面影响, 整个社会的增长率、利润率、产能利用率均提高了。这个结论是与旧增长模型的工资与利润率、增长率之间反向关系的结论相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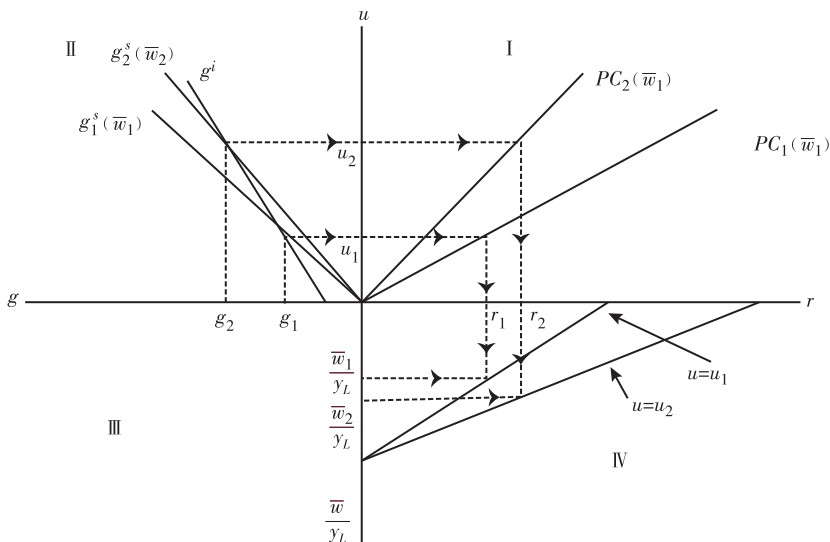


图 5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均衡图

另外, 在假定工资率水平不变的条件下, 分析储蓄率变化的影响同样可以得到节约悖论, 这一点与旧增长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对于储蓄率变化的新增长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就不再在此赘述了。总之, 新卡莱斯基主义增长模型既揭示了“节约悖论”, 也揭示了“成本悖论”。

三、卡莱斯基主义者内部关于投资函数形式的争论以及模型的扩展

当模型中引入灵活产能利用率这一变量之后, 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企业家是如何进行投资决策的, 因为此时人们认识到旧增长模型中所假设的只根据利润率做出决策的企业家行为特征似乎过于简

单和脱离现实了。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不容置疑的传统投资函数形式被抛弃了, 于是卡莱斯基主义者内部出现了关于投资函数形式的分歧与争论, 这种争论推动了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发展。

(一) 有典型投资函数形式的增长模型

阿马德奥 (Amadeo, 1986) 和罗森 (Rowthorn, 1981) 被认为是对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发展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两个人。上节中介绍的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简化版本是以阿马德奥的论述为基础的。阿马德奥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投资函数形式: $g^i = \alpha + \beta(u - u_n)$, 他认为投资者只根据产能利用率做出投资决策。而罗森采用的是另一种投资函数形式:

$$g^i = \alpha + \beta u + \gamma r \quad (11)$$

这种函数形式相比前者,加入了已实现的利润率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其中的原因正如早期后凯恩斯主义者所论述的,利润率既为投资者提供了诱导因素,也提供了融资的基础。利润率对投资的影响是公认的。其中, α 代表动物精神, β, γ 为正的系数。这种投资函数被认为考虑的因素更全面,被奉为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最基本的投资函数形式(Dutt, 1984, 1990; Lavoie, 1995)。

投资函数(11)($g^i = \alpha + \beta u + \gamma r$)和投资函数(9)($g^i = \alpha + \beta(u - u_n)$)虽然形式不同,表明投资需求的决定因素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同——成本悖论无条件地成立。所以,那些对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和谐抱有坚定信念的部分卡莱斯基主义者并不在意这两种投资函数在形式上存在的差异,他们会根据分析上的方便,在两种投资函数之间进行自由的转换。

(二)具有 M-B 投资函数形式的增长模型

对于在任何条件下成本悖论都成立的前述结论,许多作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巴杜里和马格林(Bhaduri & Marglin, 1990)。他们提出的模型具有里程碑意义,代表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巴杜里和马格林认为,不应忽视工资的双向作用:一方面更高工资会刺激需求,但另一方面高工资也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成本。在这种相反的作用下,工资率的变动对就业、产出和资本积累有一个复杂的甚至模糊的影响,成本悖论只是在某些条件之下的一种可能性。

巴杜里和马格林是通过调整投资函数来得到他们的这一结论的。他们的投资函数建立在对利润率的分解的基础上,利润率被分解成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份额,即 $r = \pi \cdot u \cdot \frac{1}{v}$ 。虽然投资仅取决于利润率是一个通常的做法,但这在理论上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并没有深入到利润率背后的各个组成部分。实际利润率 r 的变动既可能是由于产能利用率 u 的变化也可能是由于利润份额 π 的变化,仅取决于利润率的分解无法体现这两个因素的各自影响。例如,如果高的利润率仅是过高的利润份额的结果,并且伴有大量过剩产能,这样的高利润率并不会诱导投资者进行额外的产能扩张。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将区分对利润率来自有效需求的影响和来源于企业削减成本的能力的影响。而仅取决于利润率的分解会弱化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因为在这种函数中,产能利用率通过影响利润率才影响投资,它的独立

影响被忽视了。

那么在投资函数中,在利润率变量 r 之外,再加入产能利用率变量 u ,就像新卡莱斯基典型投资函数 $g^i = \alpha + \beta u + \gamma r$ 一样,是否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呢?巴杜里和马格林认为这一投资函数的问题在于,它对于投资对利润率的两个成分 π 和 u 的相对反应强加了不必要的限制。如果投资函数采取 $g = F(r, u)$ 的形式,自变量仅包括 r 和 u ,那么,这一函数具有隐含条件: $F_r > 0, F_u > 0$ 。在利润率一定的条件 $r = \bar{r}$ 下,有 $\bar{r} = \pi \cdot u \cdot \frac{1}{v}$, $\frac{1}{v}$ 为常数,则 u 和 π 此消彼长,反方向变动。 $F_u > 0$ 的含义是说,产能利用率 u 上升(下降)对投资的影响总是大于利润份额 π 下降(上升)的影响。巴杜里和马格林认为这种强加的限制条件是没有根据的,不合理的,所以应采取 $g(u, \pi)$ 的投资函数形式,把利润份额和产能利用率视作独立和分开的参数。他们指出,这种投资函数具有明显的分析优势:“对投资决策的需求方面的影响(通过更高产能利用率的加速效应)从供给方面的影响(通过低工资和高利润份额对成本降低的效应)中分离出来。”(Bhaduri & Marglin, 1990, p. 380)巴杜里和马格林采取的投资函数的具体形式可表述为:

$$g^i = \alpha + \beta u + \gamma \pi \quad (12)$$

其中, α 代表动物精神, β, γ 为正的系数。这时增长模型如下:

$$\text{投资函数: } g^i = \alpha + \beta u + \gamma \pi$$

$$\text{储蓄函数: } g^s = s_c \cdot \pi \cdot u \cdot \frac{1}{v}$$

$$\text{均衡条件: } g^i = g^s$$

$$\text{利润方程: } r = \pi \cdot u \cdot \frac{1}{v}$$

解得均衡值:

$$u^* = \frac{\alpha + \gamma \pi}{s_c \cdot \frac{1}{v} \cdot \pi - \beta}, r^* = \frac{\pi \cdot \frac{1}{v} \cdot (\alpha + \gamma \pi)}{s_c \cdot \frac{1}{v} \cdot \pi - \beta},$$

$$g^* = \frac{s_c \cdot \pi \cdot \frac{1}{v} \cdot (\alpha + \gamma \pi)}{s_c \cdot \frac{1}{v} \cdot \pi - \beta}$$

分别对 r^* 和 g^* 求关于 π 的微分,可得:

$$\frac{\partial u^*}{\partial \pi} = \frac{-\frac{1}{v} s_c \alpha - \beta \gamma}{(s_c \cdot \frac{1}{v} \cdot \pi - \beta)^2}, \frac{\partial r^*}{\partial \pi} = \frac{\frac{1}{v} \cdot (\gamma \pi - \beta u^*)}{s_c \cdot \frac{1}{v} \cdot \pi - \beta},$$

$$\frac{\partial g^*}{\partial \pi} = \frac{s_c \cdot \frac{1}{v} \cdot (\gamma \pi - \beta u^*)}{s_c \cdot \frac{1}{v} \cdot \pi - \beta}$$

其中 $\frac{\partial u^*}{\partial \pi} < 0$, 而 $\frac{\partial r^*}{\partial \pi}$ 和 $\frac{\partial g^*}{\partial \pi}$ 的符号不明确。

当 $u^* \geq \frac{\gamma\pi}{\beta}$ 时, $\frac{\partial r^*}{\partial \pi} \leq 0$, $\frac{\partial g^*}{\partial \pi} \leq 0$,^④ 成本悖论成立, 利润份额与利润率、增长率反方向变动, 经济是一种工资导向的增长体制 (wage-led growth regime)。

当 $u^* < \frac{\gamma\pi}{\beta}$ 时, $\frac{\partial r^*}{\partial \pi} > 0$, $\frac{\partial g^*}{\partial \pi} > 0$ 成本悖论不成立, 利润份额与利润率、增长率同方向变动, 经济是一种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 (profit-led growth regime)。

对上述模型可以给出如下解释: 工资份额上升 (利润份额下降) 会提高产能利用率, 然而对资本积累和利润率的影响并不明确。一方面, 工资是收入, 工资增加会增加消费需求, 并因此诱导企业的投资需求, 从而对资本积累和产出有正面效应; 但另一方面, 工资是成本, 工资增加会增加企业成本, 减少利润, 从而抑制企业的投资需求, 所以对资本积累和产出是负面效应。当工资上升对资本积累和产出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时, 工资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正, 反之, 总效应为负。工资上升的经济增长总效应为正的经济环境被称作工资导向的增长体制, 工资上升的经济增长总效应为负的经济环境被称作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为促进经济增长, 应采取有利于工资的分配政策还是有利于利润的分配政策, 取决于该经济体是哪种增长体制。

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从而经济增长的效应与企业的投资需求对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份额的敏感程度联系最为紧密。当企业投资需求对产能利用率不敏感, 而对利润份额 (或工资成本) 敏感时, 工资上升对资本积累和增长的负面效应会大于正面效应, 从而增长体制是利润导向的; 若企业投资需求对产能利用率敏感而对利润份额 (或工资成本) 不敏感, 工资上升对资本积累和增长的正面效应会大于负面效应, 从而增长体制是工资导向的。

建立在 B-M 投资函数基础上的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表明, 成本悖论仅是一种可能性, 它是有条件的, 这样就调和了卡莱斯基主义者的阶级调和论和马克思主义者或左派学者的阶级对抗论。巴杜里和马格林的投资函数、增长模型以及有条件的成本悖论理论已经在卡莱斯基主义内部得到了广泛认可, 基本形成了共识。

(三) 拉沃等人对 M-B 投资函数的批评

新卡莱斯基主义阵营中一些经济学家对来自巴

杜里和马格林的批评和修正并不以为然。拉沃 (Lavoie, 1995) 认为, 虽然巴杜里和马格林的批评仅从逻辑上考虑是无懈可击的, 但联系到企业家决策实践, 有理由认为投资函数 (11) 要优于他们提出来的投资函数 (12)。其理由如下: 第一, 利润份额并不是盈利性的一个好的指标, 一个利润份额的增加可能是感知的长期利率增加的结果, 这对于企业家来说不是个好消息。第二, 企业可能是通过观察整体经济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状况来判断他们投资计划的预期盈利性, 从可得信息的角度, 企业家估计实际利润率是最容易的, 根据利润份额做出决策是不现实的。第三, 过分关注利润份额因素, 会弱化降低利润份额、增加产能利用率对企业家动物精神的积极影响。第四, 实现的利润率是企业贷款可得性的一个好的指标, 实现的利润率高有利于企业为自己融资。

柯登提和沃恩阁 (Caldentey & Vernengo, 2013) 指出, 巴杜里和马格林的模型实质上是让需求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对投资的加速效应被利润份额效应抵消了, 供给因素对需求因素的支配性为利润导向的增长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这种强调供给因素的立场是与卡莱斯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立场相违背的, 这是对凯恩斯革命思想的反革命, 对新古典思想的妥协。方程 (9) 表示的投资函数形式才是真正凯恩斯主义的, 它刻画了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是产能利用率或者说有效需求。

四、卡莱斯基主义者对经济趋向长期均衡的机制的考察以及模型的细化

面对反卡莱斯基主义者的批判——在长期中, 产能利用率或利润率与其正常值不一致的假设和长期均衡概念是矛盾的, 卡莱斯基主义者对经济趋向均衡的机制进行了深入考察, 他们试图证明经济在长期趋向均衡的过程中产能利用率仍是内生的。卡莱斯基主义者在经济趋向长期均衡的机制的考察中, 体现出了他们关注真实世界的优秀方法论特质。

(一) 反卡莱斯基主义者对长期中产能利用率内生性的批判

对新卡莱斯基主义增长模型最根本的批评来自新李嘉图主义者, 他们否认在长期中利用率与正常利用率会有差异, 其中, 杜梅尼尔和列维 (Dumenil & Levy, 1995, 1999) 是反对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领军人物。杜梅尼尔和列维认为, 一个人在短期可能是凯恩斯主义或卡莱斯基主义者, 但在长期必然是古典主义者。他们声称, 实现的产能利用率不等

于正常值(实现的利润率不等于正常利润率)的长期模型缺乏逻辑一致性。两个值(实现的和正常的)之间的任何差异都是和“长期均衡”概念或“充分调整状况”的含义相矛盾的,因为长期均衡是指没有经济力量能使系统发生变化。当实现的利用率和实现的利润率不等于它们的正常值时,总有经济力量使系统发生变化,此时的均衡就不是作为最终静止点的长期均衡。在经过充分调整的长期,所有的变量回到正常值,这是古典主义经济学坚持的观点。所以就短期分析而言,人们可以是凯恩斯主义或卡莱斯基主义者,坚持各种变量与其正常值之间的偏离,但考虑长期均衡及其比较静态时,人们必须回到古典主义传统讨论各种变量处于正常值的状况。因此,杜梅尼尔和列维设法把一个具有需求导向特征的短期卡莱斯基主义增长模型,转变成一个长期供给导向的古典积累模型,其中,在充分调整状况,更快的增长要求更高的储蓄率和正常利润率。他们说:“论证的目的是要表明,凯恩斯主义均衡序列能收敛于古典均衡”(Dumenil & Levy, 1999, p. 685)。

对于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逻辑一致性问题——在长期中,产能利用率或利润率与其正常值不一致的假设和长期均衡概念是矛盾的——产生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如上所述,杜梅尼尔和列维提出了一种方案,这种方案认为新卡莱斯基主义假设和结论仅在短期中成立,并不适用于长期,这样就在长期中否定了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有效性。还有其他两种方案被提出,这两种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有效性。一种是考虑正常利润率的内生性,另一种是考虑正常产能利用率的内生性。

(二)引入通胀机制的正常利润率内生调整模型

拉沃(Lavoie, 2002, 2003)提出了经济趋向长期均衡的另一种方案,这种方案基于正常利润率取值的内生性,但在此之外,在调整过程中考虑到了工人议价能力,把以工人和企业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通胀机制引入到经济走向长期均衡的调整过程之中。这一方案产生了如下观点:“在长期均衡中实际价格不是正常价格,实际利用率不是正常利用率,但是,因为实现的回报率等于目标回报率,动态力量使均衡成为终点”(Lavoie, 2003, p. 56)。这一假说给杜梅尼尔和列维关于“短期坚持凯恩斯主义,长期坚持古典主义”的论断予以有力的反驳。

冲突通胀模型基于企业和工人收入主张的不一致性。通胀率是企业加价目标和主导性的劳工组织认为公平的实际工资率之间不一致程度的函数。当

企业加价程度高于工人认为公平的工资水平时,工人就会采取争取高工资的斗争,推动名义工资从而实际工资上升,企业家试图通过提高价格来保护自己从而引起一个更高的通胀率。冲突通胀模型基于两个方程。首先,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假定工会设法达成的货币工资的增长率 \hat{w} 是他们的实际工资目标与实现的实际工资率之间差异的函数。根据目标回报率的术语,工人的实际工资目标对应着工人意愿的企业目标回报率,工人实现的实际工资率对应着实际的企业目标回报率。从工人来看,正是实际的企业目标回报率 r_n 大于工人意愿的企业目标回报率 r_{mf} ,驱动了提高工资的要求。另外,假设货币工资增长率也取决于预期的物价膨胀率 \hat{p}^e 。这两个思想表述为如下方程: $\hat{w} = \Omega_1(r_n - r_{mf}) + \Omega_2\hat{p}^e$ ($\Omega_1 > 0, \Omega_2 > 0$)。其次,从企业角度看。企业评估的、理想的、意愿的目标回报率 r_{nf} 可能异于已纳入价格的、实现的、实际目标回报率 r_n 。当企业的目标加成高于实际加成,它们将加速物价膨胀。另外企业也会考虑预期的工资上涨。关于企业行为的这两个思想可以表述为如下方程: $\hat{p} = \psi_1(r_{nf} - r_n) + \psi_2\hat{w}^e$ ($\psi_1 > 0, \psi_2 > 0$)。

具有冲突通胀的目标回报率调整机制与没有考虑冲突通胀因素的目标回报率调整机制相比,最关键特征是在纳入价格的实际目标回报率 r_n 与实现的利润率 r^* 之间加入了一个新的变量——预估目标回报率 r_{nf} ,从而形成了“ $r_n - r_{nf} - r^*$ ”的分析结构。实现的利润率 r^* 现在影响的是所谓企业家预估的目标回报率 r_{nf} ,在长期二者具有收敛重合的趋势,但由于工人的议价能力和实际工资阻力,使得企业家预估的目标回报率 r_{nf} 与实际纳入价格中的目标回报率 r_n 有一个持续的差异。这样,长期调整只表现为实现 $r_{nf} = r^*$ 的过程,而不是经济回到由外生给定的正常利用率 r_n 定义的正常回报率 r_n 的过程。所以不再有外生给定的正常产能利用率作为引力的中心。

(三)基于路径依赖的正常产能利用率内生调整模型

卡莱斯基主义者(Lavoie, 1996; Dutt, 1997; Cassetti, 2006)提出的另一种使经济趋向长期均衡位置的机制是正常产能利用率的内生演化。这一次他们关注的中心从定价方程转向了投资方程。考虑新卡莱斯基模型的两个基本方程:储蓄方程(3) $g^s = s_e \cdot \pi \cdot u \frac{1}{v}$;投资方程(9) $g^i = \alpha + \beta_u(u - u_n)$ 。如前所

述,投资方程(9)中的参数 α 可被视作预期的销售增长率,当实际产能利用率等于正常产能利用率时企业希望保持的资本积累率为 α 。现在也把变量 α 内生化,假定企业家的预期和行为受到变量当前值的影响,那么,当实际的增长率超过预期的销售增长率时,企业家将向上修正预期的销售增长率;当实际产能利用率超过预期的正常产能利用率时,企业家也向上修正预期的正常产能利用率。用两个微分方程来描述预期的销售增长率和正常利用率的动态变化过程:

$$\dot{\alpha} = (g^* - \alpha) \quad (13)$$

$$\dot{u}_n = \sigma(u^* - u_n) \quad (14)$$

上述四个方程构成了预期销售增长率和正常利用率均内生的增长模型。经过数理推导可以得出结论:在长期充分调整位置,节俭悖论和成本悖论仍有效;凯恩斯主义或卡莱斯基主义经济学家在长期不必变成古典主义者。

这种预期销售增长率和正常利用率均内生的增长模型没有确定的解,而是存在一组可能解。新的最终长期均衡位置取决于过渡期间的调整过程,它依赖于变量的初始值和企业家的反应参数,即企业家在过渡期间的行为。这是一个滞后模型,不是如同大多新古典模型所说的那样,居民的供给行为对正常率有一个影响,而是需求方面的投资行为引起了路径依赖;它摆脱了新古典的“自然率”思想,因此摆脱了长期由供给决定的想法,经济没有天然注定的“自然锚点”,系统长期达到的均衡将随着短期动态而变化。需求和政策的变动将对经济有持续的影响。产能利用率随着系统的路径而变化,作为结果,历史事件有多重和变化的均衡。为了解释名义变量能够影响真实变量,不需要价格是粘性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是这些模型的主要特色。路径依赖模型最令人兴奋的结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有效的。拉沃批评说(Lavoie, 1996, p. 143),杜梅尼尔和列维的分析,在一个均衡位置到另一个均衡位置的过渡中不让过渡自身影响最终均衡的位置,即均衡不是路径依赖的。调整机制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充分调整位置,这个位置不受需求力量影响,它们的正常均衡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一个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中自然失业率的角色。

五、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当代转向的得失评价与前途展望

(一)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当代转向的内涵概括
通过前面几节的论述可以看到,新卡莱斯基增

长模型对新剑桥增长模型的取代无疑是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转向,这种转向是全方位而又具有根本性的。就增长模型构建本身来看,从产能利用率外生给定转变到产能利用率由收入分配决定的内生变化,从分配由投资内生决定转变到分配被外生给定,从揭示节约悖论转变到揭示成本悖论,从揭示增长对分配的影响转变到揭示分配对增长的影响;就方法论特征来看,从灵活价格机制、完全竞争、充分产能利用等理想化世界预设转变到对寡头垄断、冲突性通胀、路径依赖等真实世界的考察;就模型关注的重心来看,从利润实现机制研究转变到投资决策机制研究;就模型提供的政策含义而言,从收入再分配问题转变到经济增长体制问题。

(二)当代转向的积极意义

通过从新剑桥增长模型向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转变,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实现了一次成功的蜕变,它克服了早期增长理论所具有的先天缺陷,同时对其优良传统进行了发扬光大。

第一,旧增长模型坚持充分产能利用率的假设,这使其模型在逻辑上和结论上都与现实存在不一致的现象。新增长模型坚持可变产能利用率的观点,通过可变产能利用率假设彻底改写了旧增长模型。这一改变使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新得到梳理:收入分配决定经济增长,而不是增长决定收入分配;这一改变使得模型结论与经济现实更加契合:提高工资收入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劳资双方可以以不以牺牲对方为代价而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第二,在旧增长模型中,一方面,其模型得出收入分配是由增长率内生决定的结论,另一方面又主张政府加强收入分配调节,而模型结论无法为其收入分配主张提供理论基础。与之不同,新增长模型把配置于自变量的地位,进行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它尝试把收入分配看作外生变量,使收入分配不再由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内生决定,而是由阶级关系、社会、法律、制度力量决定,这为政策变量的引入创造了条件,弥补了内生分配理论与分配政策主张分离的窘境。

第三,旧增长模型陷入内生收入分配模型而不能自拔,把精力耗费在价格对分配的调节机制研究上,而对更令人关注的增长本身却置之不理。而新增长模型扭转了这一态势,把企业家的投资决策置于研究中心,重新思考指导企业家决策的信号:是利润率、利率、物价等市场价格信号还是像产能利用率、需求数量、库存等数量指标。新增长模型一方面

通过选择抛弃新古典经济学万能的价格调节机制,强调凯恩斯主义的数量调节而回归凯恩斯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也为吸收人类行为研究的最新进展,开展投资决策机制研究敞开了大门。

第四,旧增长模型一直高举着反主流的大旗,追求真实世界的经济研究,采取了整体主义方法,指出利润的产生、实际工资的决定取决于经济整体的运行情况,而不是取决于个别企业中资本、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它把增长看作是历史时间当中的过程,把预期引入分析从而把事前因素和事后因素区分开来;它抓住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制度特征,依据收入来源、储蓄倾向不同对社会人群进行了阶级划分,论述了不同阶级在增长中的作用及增长带来的阶级关系的变化。然而旧增长模型并未和主流经济学进行彻底决裂,它坚持灵活价格机制、完全竞争、充分产能利用等理想化世界预设。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妥协。而新增长模型要做得彻底得多,它更多地关注了寡头垄断、冲突性通胀、路径依赖等现实复杂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剔除了旧增长模型残存的新古典经济学“恶习”。

第五,新增长模型关注的重心从储蓄函数转向了投资函数,从“投资为自己创造储蓄”的机制研究转向了企业家投资决策机制研究。这种研究重心的转向带来一个好处,就是研究者把精力从纯粹的抽象思辨转变到企业家行为的经验观察中。新增长模型研究重心的转变方向是正确的,它符合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精神实质:探讨投资、预期、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刘文超,2015)。新增长模型研究重心的转变在实践上意义是重大的,这一转变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表现为,模型为我们揭示了企业家行为特征与经济增长体制之间的内在关联:投资函数中参数在一定取值范围内会造就一种工资导向的增长体制,而在取值范围之外会造就一种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相比于旧增长模型,新增长模型在研究深度上前进了一步,它不仅把问题的焦点引到分配对增长的影响中,而且更深入一步,探讨了决定分配的增长效应的体制条件。

(三)当代转向的不足之处

一旦从理论上揭示出收入分配的增长效应与该国的经济增长体制有关,卡莱斯基主义者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实证研究上。纳斯特帕德(Naastepad,2006)分析了1960—2000年间8个OECD国家的经济变动及原因。他认为1980—2000年间经济增长乏力,而这些国家采取的限制工资的政策不仅是无效的,而且

起到了负作用。他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主要国家都属于工资导向的需求体制,也就是说,工资上升引起消费增加对总需求产生的积极作用,会大于工资上升导致投资减少对总需求产生的消极作用,所以在这些国家,采取抑制工资的政策是不恰当的。其他一些学者也做过大量类似工作(Bowles,1995;Glyn,1997;Hein,2008;Stockhammer,2012)。

事实上,卡莱斯基主义者对增长的研究在理论上的转向并不彻底。他们把企业家投资行为特征视作既定、不变和永恒的,他们所做的工作是采取实证的方法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属于哪种增长体制,然后提出促进增长的举措:如果是工资导向增长体制就应采取高工资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如果是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就应采取压低工资的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但他们从来不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行为特征、从而经济特征是如何形成的,是否应该转变这种特征,以及如何转变。但我们更关注这些问题:从规范的角度,我们更喜欢哪种增长体制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增长体制?这是关心中国改革前程和经济增长前景的人更关注的问题。如果实证结果证明中国是利润导向的增长结构,是不是我们心甘情愿地保持这种结构,并且通过压低工资收入的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实际上我们更希望中国是一种工资导向的增长体制,使得劳资双方都能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在增长过程中保持社会各阶层的和谐而不是分化,所以我们更关心一个社会如何才能从利润导向增长体制转变成工资导向增长体制。区分分配策略与增长体制,构建与分配策略一致的增长体制应成为实施收入分配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不能不考虑增长体制建设而片面地追求分配目标。如果认识不到增长体制是可构建的,就会在分配策略引起短期增长衰退面前动摇分配改革的决心。

由于大多卡莱斯基主义者缺乏历史观,致使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凯恩斯的“动物精神”行为理论运用非常谨慎,在使用中比早期后凯恩斯主义者更为保守,它们在非常狭窄的意义上理解“动物精神”,仅仅在投资函数中设置一个自主变量来代表动物精神,而其他变量都不受动物精神的影响。动物精神成了无法给出因果解释的神秘变量。由于卡莱斯基主义者把动物精神视作不可解释的随机变量,也就不可能解决早期后凯恩斯主义者“悬而未决”的问题:动物精神是人的自然特征还是社会特征?如何模型化动物精神?这一问题限制了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取得更大的进展。

(四)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前途展望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根据不同的企业家投资函数假设得出不同的结论。他们为企业家投资函数应是哪一种、从而经济增长是工资与利润同向的还是反向的问题争论不休。换一种思路,这些争论不正说明从理论上确实存在两种增长体制吗!而每一种增长体制都是由特定的企业家投资的行为特征决定的。我们应该对“动物精神”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可以认为,企业家的投资决策特征是一种“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投资更看重产能利用率带来的广阔市场还是低工资带来的低成本,这是两种不同的企业家精神,因此,企业家精神决定着经济增长体制。借助批判实在论关于结构与主观能动性之间关系的观点(Bhaskar, 1989, p. 36):已有的社会结构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条件,而人类活动再生产或改变着已有的社会结构。于是我们这样严格地描述企业家精神与增长体制之间的关系:增长体制塑造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再生产和转变着增长体制。如果当前企业家阶层的一种普遍心理是,认为工资的普遍下降对他们是有利可图的,那么经济实践将是利润导向的。即在这种利润导向的企业家精神之下,采取一项压低工资的政策就会对投资产生明显刺激,从而经济增长加速并且企业家利润率提高,因此利润导向的企业家精神被证明是正确的,这种企业家精神被强化,被再一次塑造出来,进而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再一次被生产出来。所以,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使利润导向的企业家精神不断被塑造出来,而这种企业家精神被塑造的同时也使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被维持,被更具利润份额偏好的企业家阶层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结果循环往复,相互加强,利润导向增长体制被固化了。

遵循非主流经济学的反机械论观念,我们不应该把企业家精神与增长体制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个自治的封闭系统,企业家精神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范畴,不应认为它对增长体制仅做被动反应,由经济过程完全决定,而要认识到,它也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广泛影响,是社会的产物,它是一种大众心理、社会文化现象,受到社会的法律、习俗、文化传统、经济思想、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认识来自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斯主义惯例性决策理论的启发。习俗、传统、文化和经济因素共同决定企业家精神。“公司是否从事创新的项目,是否忠诚对待他们的员工以及尊重它们的社区居民,甚至是否遵守法律,都反映了它们作为其中一员的文化的一部分”(本杰明·弗里德曼, 2013, 第14页)。

既然已经把一种增长体制的存在归结到与之相匹配的企业家精神上,所以,改变企业家精神是改变经济增长体制的一种途径。建设一种有利于工资导向的企业家精神生存的社会文化是实现增长体制转变的有效方法。当社会形成一种尊重劳动、关注劳动者生活状况、把改善民生当作社会进步目标的文化氛围时,企业家也会具有同样的心理,从而企业家也会潜意识地从社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解读出积极信息,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不会成为社会资本形成的根本障碍。企业家们也将转向创新等方面谋求发展出路。低成本依赖是缺乏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精神滋生的土壤。堵死低成本退路将有利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这样就可以借助新卡莱斯基增长理论、制度主义企业家行为理论和批判实在论三者的视域融合,实现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将其转化成增长体制转变理论。该增长体制转变理论试图说明改变增长体制应该从何处入手,即应该通过政治、政策、法律、文化等因素影响、规制、塑造企业家精神和行为,行为改变增长体制,改变的增长体制进一步塑造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家精神。

六、国内理论界开展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研究的现实意义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已经取代了新剑桥增长模型成为当代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主体,这使得后凯恩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国外关于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新卡莱斯基模型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我国学者开展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创新与应用研究很有必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为分析我国当前工资水平上升的增长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状况是,在工资收入份额经历了长期的恶化之后,最近几年开始呈现不断的上涨趋势。工资收入的上升在改善劳动者生活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经营上的成本压力。对于最近几年中国出现的局部“用工荒”现象,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企业难以为继、一些外资撤出等现象,社会上出现了悲观的声音,有人表达了需要关注工资过快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呼吁。这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给整个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对这个影响的判断将直接决定国家收入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到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分析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这些新现象,如

何预测这些新现象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成为摆在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而严肃的课题。

对此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可以提供很好的分析思路。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重要特征恰恰是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它借助有效需求因素,令人信服地把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揭示出来,它提醒我们“成本悖论”是需注意的经济现象;不仅如此,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还认识到成本悖论只是在某些条件之下的一种可能性,他们进而分析了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条件,这可以成为预测我国当前分配状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依据;此外,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工资导向增长体制和利润导向增长体制的划分与分析,又不得不让我们认识到,评价工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要看短期的增长效应,还要看长期中的增长体制转变效应。总之,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收入分配的增长效应的分析深刻而全面,为分析我国当前工资水平上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指导意义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工资和利润之间收入分配影响总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机制的研究、对工资导向型和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的划分、对工资导向增长方式实现条件的探讨等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不仅对分析我国当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收入分配分化严重、工资成本压力加大、增速回落现象并存的增长困境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对于我国实现由利润导向向工资导向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启发意义。我国学者在研究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1)他们的研究集中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而对利润驱动向工资驱动的转变问题的关注不够。(2)少数学者虽然研究了工资收入水平和份额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但他们并没有借鉴和吸收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这个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结果导致他们的研究对于工资上升对增长的正面效应的机理的揭示缺乏严谨性和精确性,没有注意到工资上升对增长发挥正面效应是需要条件的,没有认识到工资导向的增长是一种增长体制的产物,这种体制需要建设才会出现。我国实施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收入分配策略的前提是要构建一个工资导向的增长体制,所以利润导向向工资导向增长体制转变的途径问题是增长方式转变研究的重要内容。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虽然主题是收入分配对增长的影响,但它只是在高度抽象的基础上,研究了分

配对增长的作用机理以及对工资导向和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进行了界定,同时对于某些国家属于哪种体制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它还不是增长体制转变的理论。要成为增长体制转变的理论,就必须从更具体的角度分析要实现工资导向的增长需要的约束条件。我们只需对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做出扩展,运用新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放松假设条件,引进工人储蓄、政府部门和国际部门,探讨实现工资导向增长需要怎样的税收制度、储蓄制度、货币制度、资本市场制度、外贸制度等,然后,就可以以之为基础对我国增长体制转变提出对策主张。因此运用和扩展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可以有助于分析我国从利润导向向工资导向增长体制的转变途径问题。

注:

- ①关于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的详细论述和评论可参见拙作《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3期。
- ②笔者认为阿马德奥(Amadeo)的论文《在长期分析中产能利用率的作用》(1986)对于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发展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阿马德奥在论文中构建的模型成为后来发展起来的众多新卡莱斯基模型的基础。
- ③这是最早由斯坦德尔(Steindl, 1952, p. 128)提出,由阿马德奥(Amadeo, 1986)引入增长模型的投资函数形式。
- ④根据经济收敛条件(10),已假定 $\beta < s_c \cdot \pi \cdot \frac{1}{v}$ 。

参考文献:

- 本杰明·弗里德曼, 2013:《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拉沃, 2009:《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山东大学出版社。
- 刘文超, 2015:《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
- Ahmad, S. (1986), "A Pasinetti theory of relative profit share for the anti-Pasinetti case",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9(1):149-158.
- Amadeo, E. J. (1986), "The role of capacity utilization in long-period analysis",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the Surplus Approach* 2(2):147-185.
- Baranzini, M. (1975), "The Pasinetti and the anti-Pasinetti theorems: A reconciliatio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7(3):470-473.
- Bhaduri, A. & S. Marglin (1990), "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4(4):375-393.
- Bhaskar, R. (1989),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Hemel Hempstead, UK: Harvester Wheatsheaf.
- Blecker, R. (1989),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 13(3): 395—412.
- Bowles, S. & R. Boyer (1995), “Wages, aggregate demand, and employment in an open econom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G. Epstein & H. Gintis (eds), *Macroeconomic Policy after the Conservative Era; Studies in Investment, Saving and Fi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ldentey, E. & M. Vernengo (2013), “Wage and profit-led growth: the limits to neo-Kaleckian models and a Kaldorian proposal”, *Working Paper* No. 775, 1—37.
- Casseti, M. (2006), “A note on the long-run behaviour of Kaleckian model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 497—508.
- Chiang, A. C. (1973), “A simple generalization of the Kaldor-Pasinetti theory of profit rate and income”, *Economica* 40 (159): 311—313.
- Ciccone, R. (1986), “Accumulation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Some critical considerations on Joan Robinson’s theory of distribution”,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the Surplus Approach* 2(1): 17—36.
- Committeri, R. (1986), “Some comments on recent contributions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the Surplus Approach* 2(2): 161—186.
- Dumenil, G. & D. Levy (1995), “A post-Keynesian long-term equilibrium with equalized profit rates? A rejoinder to Amitava Dutt’s synthesi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7(2): 135—141.
- Dumenil, G. & D. Levy (1999), “Being Keynesian in the short term and classical in the long term: the traverse to classical long term equilibrium”,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67(6): 684—716.
- Dutt, A. K. (1984), “Stagn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onopoly power”,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8(1): 25—40.
- Dutt, A. K. (1990),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tt, A. K. (1997), “Equilibrium, path dependence and hysteresis in post-Keynesian models”, in P. Arestis et al (eds), *Markets Unemployment and Economic Policy: Essays in honour of Geoff Harcourt*, London: Routledge.
- Glyn, A. (1997), “Does aggregate profitability really matter?”,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1(5): 593—619.
- Hein, E. & L. Vogel (2008),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reconsidered: Empirical results for Austria, France,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the UK and the US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2(3): 479—511.
- Kalecki, M. (1942), “A theory of profits”, *Economic Journal* 52(206): 258—267.
- Kaldor, N. (1956),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3(2): 83—100.
- Kaldor, N. (1957),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67(268): 591—624.
- Kaldor, N. (1966), “Marginal productivity and the macroeconomic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Comment on Samuelson and Modigliani”,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3(4): 309—319.
- Lavoie, M. (1992), *Foundations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 Analysis*, Edward Elgar
- Lavoie, M. (1995), “The Kaleckian model of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and its neo-Ricardian and neo-Marxian critiqu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 789—818.
- Lavoie, M. (2002), “The Kaleckian growth model with target return pricing and conflict inflation”, in M. Setterfield (ed), *The Economics of Demand-led Growth*, Edward Elgar.
- Lavoie, M. (2003), “Kaleckian effective demand and Sraffian normal prices: Towards a reconciliatio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5(1): 53—74.
- Naastepad, C. & S. Storm (2006), “OECD demand regimes (1960—2000)”, *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29 (2): 213—248.
- Pasinetti, L. L. (1962), “Rate of profi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elation to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4): 267—279.
- Robinson, J. (1962),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Macmillan.
- Robinson, J. (1956),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 Rowthorn, B. (1981), “Demand, real wages and economic growth”, *Thames Papers in Political Economy*, Autumn, pp. 1—39.
- Samuelson, P. A. & F. Modigliani (1966), “The Pasinetti paradox in neoclassical and more general model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3(4): 269—301.
- Steindl, J. (1952), *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Stockhammer, E. (1999), “Robinson and Kaleckian growth: An update on post-Keynesian growth theories”, Engelbert Stockhammer Working Paper, No. 67.
- Stockhammer, E. (2012), “The finance-dominated growth regime, distribution, and aggregate demand in the US”,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Busines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No. 126.
- Taylor, L. (1991), *Income Distribution Inflation, and Growth: Lectures on 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ic Theory*, MIT Press.
- Vianello, F. (1985), “Effective demand and the rate of profit: Some thoughts on Marx, Kalecki and Sraffa”, in M. Sebastiani (ed.), *Kalecki’s Relevance Today*, St. Martin’s Press.

(责任编辑:李仁贵)